

主权外部性与币缘战略

——关于发展陷阱的案例研究

Sovereignty Externalities & Money-strategy: The Cases Study of Development Trap

温铁军 等（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乡村建设学院）¹

摘要：本报告以全球化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为据，²提出两个论点。其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成本转嫁”而沉落于发展主义陷阱的根本教训，在于其在向殖民主义宗主国争取国家“合法”独立的交易中，已经形成了失去资源和经济主权的负外部性。其二，当前金融资本时代强权政治控制的币缘战略不同于传统的产业资本时代的地缘战略，并且在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球竞争框架中，客观地形成了金融主导国家币权为核心的“币权三角”；由此衍生出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乃是制造业国家承担金融化制度成本的内在机制。

这些理论创新，可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成因。

关键词：主权外部性 币缘战略 国家竞争 微笑曲线

本文把通过非暴力形式的政治谈判这种“交易”来形成发展中国家独立主权进程中与生俱来的制度性缺陷，称为“主权外部性”；把金融资本阶段凭借政治强权维护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并据此向能源和食物市场释放过剩流动性，借以把巨额债务转化为他国通胀危机的“巧实力”运作，称为“币缘战略”。

这两者都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改出发展陷阱的主要原因，也是金融全球化阶段内在形成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的前提条件。

¹ 本报告写作和资料整理主要依靠研究团队协作。其中，温铁军提出理论观点并对本文修改定稿；刘健芝组织团队讨论和翻译；黄德兴和薛翠起草本文草稿并做英文翻译；所摘引之原稿中关于主权外部性见于 E7 比较研究报告，主要由黄德兴在团队讨论基础上承担文字起草；关于币缘战略的原文为内部报告，主要有董筱丹和兰永海起草；关于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及其文字分析，由董筱丹在团队讨论的基础上起草初稿。

² 温铁军，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一、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外部性问题

由于，非暴力革命形成政治主权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获取政治主权的谈判中因“信息不对称”而把经济或资源主权让渡给原宗主国或跨国资本；因此，这种以经济让步为代价形成的政治国家，其资源及货币等经济主权方面具有内生的制度性缺陷，这就是“主权外部性”。据此可以解释的现象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越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努力符合西方要求，就越会因这种主权外部性难以化解而在经济基础领域深陷于“发展陷阱”不能自拔。

以下中国、南非和委内瑞拉的三个案例，可以作为本文提出主权外部性问题的经验依据。

案例 1.1 中国的“土地革命红利”：农民小资社会承载危机代价

如果认真观察近代众多民族独立运动或民众抗争的历史，很少有像中国那样的经验——通过发动占人口最多数的农民参加武装革命取得相对完整的国家主权。这导致由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人民政府能够在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同时，彻底改变过去占有绝大部分利益而向全社会直接转嫁制度成本的、官僚资本和跨国资本相结合而构建起来的制度和法律；在没收其一切财产的革命中，直接控制全部经济资源并占有收益。

这种无数贫苦农民流血牺牲换来的、作为大多数人民的后来者不必再向原所有者支付代价即可占有财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制度收益，可以称为不再发生国家主权负外部性的“革命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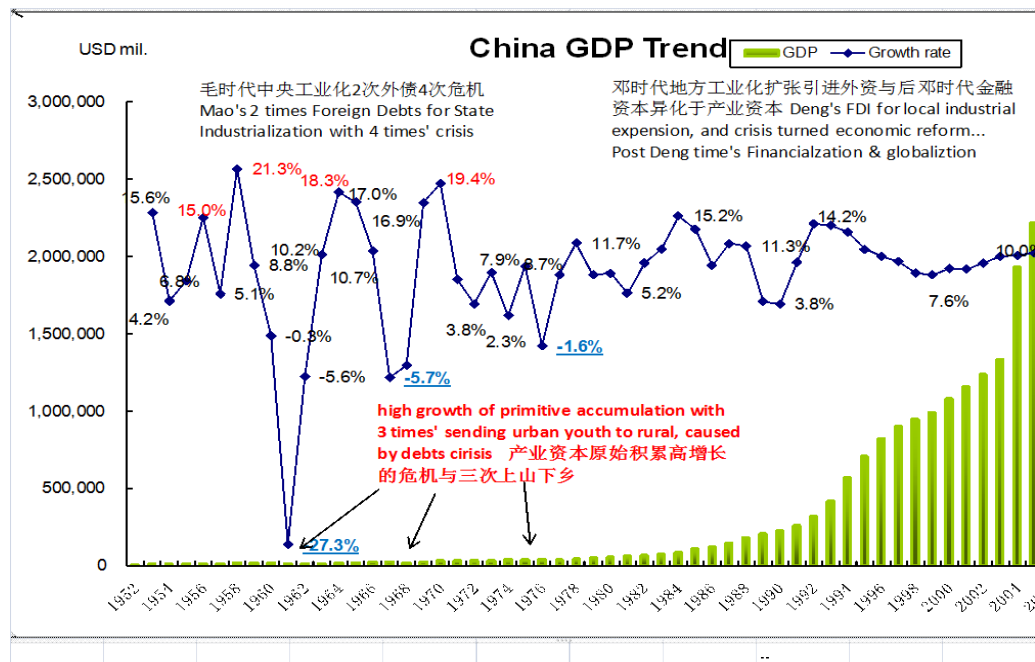
中国在 1949 年革命成功后推行土地改革，全国有 85% 的农民获益。几乎每个贫苦农户都分配到一小块耕地，虽然人均耕地仅 1 亩多，但是却使得中国大部分人口都拥有小量资产。所以 1970 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描述“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户所拥有的小块耕地成为农民生存的最后保障。

据此可知，**中国通过土地革命所建立的，是世界最大的小资国家……**

不仅 1949 年土改，中国在城市开展工业化原始积累期间，每次遭遇经济危机都重复着向农民平均分地的政治措施。例如：中国 1960 年遭遇苏联投资中辍和撤走技术援助带来的城市产业资本危机，接着是 1961 年政府提出人民公社 60 条，其中主要政策是允许农民拥有以庭院地、自留地、拾边地和小开荒等名义的土地权利；1980 年遭遇大规模引进西方资本转化的国家债务危机，接着是 1981 年开始落实农民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家庭承包制”；1997 年遭遇东亚金融危机，遂于 1998 年以“二轮承包”为名按人口重新平均分地并且明确农户地权永远不变……³

³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序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

中国60年4次外债外资及8次经济危机 60 years' GDP Growth & 4 Times' Foreign debts with 8 Times' Cyclic Crisis



以上案例表明，如果看中国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及其形成完整产业、进入资本扩张之后的所谓高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在享受 1949 年的革命红利——土地革命造成的最大小资社会及建于其上的制度基础。

中国在土地革命之后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具有“城市是资本池而农村是劳动力池”的特点，客观上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所谓“比较优势”：

一是长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百分之百拥有私人住房和土地，这使中国与其他国家之最大不同是有下层社会却没有绝对贫困人口，并且全国私人住宅拥有率达 89%，虽然高于美欧日发达国家但在农村却并不计算为个人资产；尽管 1990 年代激进市场化改革以来城市大规模失业导致的贫困率增加、富裕人口财富占比和基尼系数标志的贫富差别都显著增加，但农村社会仍然相对稳定。

二是“农村劳动力池”在过剩劳动力趋向市场化定价的几十年里，长期、大量地向城市输送“三低（低再生产成本、低对抗性、低社保成本）”的流动劳动力，尽管遭到多种不公正待遇且已经发生很多次劳资冲突，但内在具有东方农户理性的中国农民打工者的大多数却并未遵从西方 19 世纪阶级政治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开展工会运动；目前中国约有 2 亿多农户，农民外出打工者超过 2 亿，只有这部分人完成在城市的定居之后，中国才完成农民打工者的工人阶级化进程。

以上情况，也是近 20 年中国加入全球化虽然遭遇到两次“输入型经济危机”却都免于

堕入发展陷阱的主要原因。

案例 1.2: 南非的主权外部性及其制度化演变

1955 年, 非洲国民大会(ANC)提出了自由宪章, 明确主张土地分配, 矿场、银行和垄断企业应属全民所有, 工业和贸易服务于人民的福祉, 每个人都能享受免费教育、饮用水、电力、宜居的住房, 以及工作权利等。这个具有民族民主革命宣言性质的自由宪章, 一直是南非反种族隔离的斗争纲领。

但是, 到了 90 年代初, 白人政府和 ANC 谈判, 最终提出放弃种种政治特权的“交易”条件是黑人新政府要接受一系列体现新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纲领, 例如容许一个独立不受制约的中央银行, 这等于阉割了政府对本国金融政策主导权; 南非也要继续溶入全球化, 以不许补贴本国工业的不利条件加入 GATT(WTO 前身), 由此也无法创造就业增量; 此外还接受了 IMF 的约束性贷款, 压抑工资, 限制政府开支; 在世界银行的主导下, 南非还得推动食用水和电力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私营化。新政府还答应承担种族隔离统治下白人政府背负的外债(250 亿美元), 理由是要维持投资者的信心。黑人民众过去没有从这些负债中享受到丝毫福利, 现在却要负责买单。

通过这种交易形成的主权具有严重负外部性。ANC 不仅没有履行公有化矿产等自由宪章给出的承诺, 反而为了偿还每年 45 亿美元的债务积极地私有化国家资产。同时, 新政府维持亲资本政策, 放宽金融管制(容许南非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 并把金融总部迁至海外); 由此使得南非经济高度金融化, 形成全球最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2009 年, 《经济学人》评选南非为 17 个新兴市场中最为不稳定的一个。

1994 年 ANC 开始执政, 由于仅有对于白人执政时期的议会政治的延续, 而没有掌握经济资源主权, 于是, 南非农场和矿场土地大部分仍然由白人所拥有。**占人口约 14.1% 的白人拥有全国 87% 左右的土地;** 而占总人口 74.8% 的黑人却只有不到 13% 的土地。到了 2009 年, 黑人拥有的矿场产权亦只有 8.9%。在 1990 年, 南非白人农场平均每户占地 1462.15 公顷, 而在尚未宣布独立的 6 个黑人家园总人口为 701.3 万,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 86 人, 而土地总面积只有 883.8451 万公顷, 连城镇、道路、河流、荒漠等都算在内也只有每人 1.26 公顷, 只相当于白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的 0.34%!⁴虽然南非政府计划在 2014 年前, 把白人农场主拥有的 8200 万公顷的农地中的 30%, 即约 2450 万公顷, 转移给黑人农民。但到了 2012 年初, 通过这项土地改革转移的土地只有 670 万公顷。

其结果是:

- 1994 至 2006 年, 绝对贫困人口(收入低于 1 美元一天)从二百万增加至四百万, 1995-2005 年间, 黑人家庭收入平均减少了 1.8%, 同期白人家庭却增加了 40.5%; 基尼系数从 1995 的 0.56 升至 2006 年的 0.73; 2009 年南非的基尼系数仍达 63.1, 是全球贫富差距第二高。

⁴ 孙红旗著《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12-13。

•黑人的失业率高达 28%(实际数字更高,因为官方统计把行乞、靠打猎和种地为生都列为就业);

•ANC 建造了 180 万间低质素房屋(作为推动经济的手段),但同时有二百万人失去居所;在 2006 年超过 4 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

•在民主新政第一个 10 年里,一百万人被驱赶离开农地;饮用水私营化改制之下,每年有 150 万户付不起水费被截停食水供应……

案例整理:黄德兴

参阅: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新兴七国研究南非报告》 *South Africa Historical Review* www.emergingcountries.org

南非本来是殖民地型经济,与 ANC 谈判的白人政府本质上是后殖民主义代表,其种族隔离的内涵是“超级剥削”,所以反种族隔离的斗争本身必须包括黑人的经济权力。1980 年代以前,南非的政策是典型的重商主义。黑人在白人政权和资本压迫下饱受超级剥削。虽然后来黑人通过斗争获得国家政权,但在这个交易之中 ANC 几乎完全放弃了经济主权,结果是不经过自由主义而直接进入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政治上黑人拥有形式上平等的公民权(投票权、公民自由等);然而在经济层面,无形的种族隔离完全没有改变。黑人政府掌握的,只是一个被掏空了经济权力的政治空壳。在这种主权负外部性影响下,种族矛盾已经在黑人政权建立起来之后转化为阶级冲突。例如 2012 年 8 月 16 日南非东北部西北省的马瑞康纳(Marikana)白金矿区爆发严重流血冲突,镇暴警察对手持砍刀和棍棒的示威矿工开火,导致矿工卅四人丧生、七十八人受伤。这是南非自一九九四年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以来警方镇暴行动造成最多伤亡的流血事件。

这种主权外部性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性。

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也有通过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斗争重新收回经济资源主权的案例。委内瑞拉就是其中的典型国家。

案例 1.3 委内瑞拉收回经济资源主权的“查韦斯革命”

从数据上看,委内瑞拉曾经是拉美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之一(1960 年委内瑞拉人均收入高居全球第 18 位);但,石油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石油资源的开发、贸易及其收益,主要是跨国公司控制。这与其他拉美资源经济国家内生性具有主权负外部性的问题类似。

1、委内瑞拉连续遭遇危机和政权更迭

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委内瑞拉人均收入下跌到 40 位。20 世纪 80 年代是拉美“失去的十年”,国际油价下跌使委内瑞拉出口收入锐减,外债激增,被迫放弃实行数十年之久的进口替代,转向市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到 1990 年人均收入下跌至全球 72 位。1990 年代改革过程中拉美经济恢复增长,而委内瑞拉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贫富分化

现象日趋严重，几乎经历了第二个“失去的十年”：1990年代平均增长率仅为2%，低于地区平均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见下表）；贫困率由1990年的40%上升为1999年的49.4%。

	平均 GDP 增長		城市失業率 (1991-2000 平均值)
	1981-1990	1991-2000	
阿根廷	-0.7	4.2	12.7
巴西	1.6	2.6	6.0
墨西哥	1.9	3.5	3.6
智利	3.0	6.6	7.5
哥倫比亞	3.7	2.6	12.5
秘魯	-1.2	4.2	8.7
委內瑞拉	-0.7	2	10.7
平均	1.2	3.3	7.4

表 2.26: 拉美七国 GDP 增长率和城市失业率 (%，1981-2000 年)

资料来源: 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0,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00, P.85,89

1994 年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委内瑞拉国内数十家银行倒闭，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持续恶化。对此，政府采取紧缩开支、控制信贷、增加财政收入、调整物价、实施管制外汇等应急措施，使经济连续三年负增长的局面得以缓解。但 1996 年 4 月政府宣布了取消外汇管制、放开利率、提高汽油价格、增加税收等新经济措施，同时也制定了一些社会补偿措施。新经济措施颁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与委内瑞拉签署了 33 亿美元贷款的初步协定。2001 年底，受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探戈效应”影响，整个拉美在 2002 年陷入衰退（2001 年 GDP 增长率为 0.4%，2002 年为-0.4%）。如果说拉美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的话，那么委内瑞拉也许是受害较为严重的一个。

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委内瑞拉的“彻底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公和贫困率大幅度上升，一定程度上促使倡导社会公正的左派领导人查韦斯在 1998 年 12 月大选中获胜。此后他在有背景的军事政变中遭到逮捕，主要靠来自贫民窟的广大群众面对政变枪口的奋勇斗争才能再度掌权。这个依靠平民发起街头革命翻身的政治家由此成为新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批判者，认为西方国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及金融全球化使拉美经济的脆弱性、社会不公正和贫困日益严重。因此他主张通过建立“21 世纪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替代。

委内瑞拉最具革命性的主要措施为：在政治上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构建底层民众的参与式民主；在经济上通过石油业国有化等加强国家对经济主权及其收益的控制；以全球危机伴生的油价高企获取溢价收益来加强财政投入于“内生发展”和社会建设，改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正状况。进一步提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ALBA）以加强拉美内部团结和一体化，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抗衡主导国家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

进入新世纪以来，拉美其他左派政府相继上台并且提出类似改革方案，如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和厄瓜多尔的“21 世纪社会主义”。

2、委内瑞拉收回石油主权及其对国民福利的影响

1999年，委内瑞拉全民公投通过了新宪法，其中第12条规定：所有存在于本国领土内、领土范围内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床下的矿产资源及碳氢化合物资源都是共和国的财产。这就使外国投资者无开采权而只是合资企业的一部分股票的持有者，有开采权的是合资企业，其中国家的股权持有率必须超过50%。该法施行两年后，石油开采地使用费从原先的16%提高到30%。2005年4月12日，石油部下令PDVSA（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董事局修正所有有关碳氢化合物的条款并评估在一年内废除这些条款的法律机制。2006年3月31号，议会通过第38410号法案，规定了加入合资企业的条件和操作方式。2007年2月26日开采奥里诺科重油带合资企业法案（Decree-Law on Migration to Joint Ventures of the Association Agreements of the Orinoco Oil Belt）的颁布是巩固石油资源国家主权的一大步。委内瑞拉由此重新控制了石油工业的运作并增加了财政收入。

在石油主权回归国家控制的大环境下，过去十年里委内瑞拉的GDP呈不断增长趋势。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增加的收入，投资在以下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教育，医疗，体育活动设施及住房。失业率在下降，福利事业的支出在政府支出的百分比则在提高。同时，委内瑞拉在人类发展指数，基尼系数，贫困人口百分比都有很好的表现。具体表现在：

- 2009年，成功地把贫困人口数目减半，达成一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 教育：提高了小学、初中及高等院校的入学率。通过“罗宾逊项目”，在2007年消除了文盲，全国大学入学率在拉美国家中名列第二，全球名列第五。

- 医疗：政府在国民健康医疗方面投资巨大，成立了贫困社区基础医疗中心，综合治疗中心，人民诊所，拉美儿童心脏病治疗医院等等。

- 交通：在3个最大城市建造了6条地铁线路；在Orinoco河上建了第二和第三座桥梁；又建设了两条铁路等等。

- 运动设施：07年委内瑞拉成功举办了世界最古老的足球锦标赛——美洲杯，并为此建设了9个能各自容纳3万观众的足球场。

- 科技：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

- 电力设施：在Caroni河上建造了水电站，总计25亿美元，全国电力系统增添了2280兆瓦。目前正在同一条河上建设59亿美元的新水电站，到2014年产电2000兆瓦。

委内瑞拉成功地将石油收归国有，完善了税收政策。如果说国际石油公司仅仅是为了利润在掠夺资源，那么国有石油公司则是为了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在做贡献。从以上的数字和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已经成为促进国家及其人民发展的一大动力。

案例整理：黄小媚

参阅：〈新兴七国研究报告——委内瑞拉报告〉(www.emergingcountries.org)

资料来源：黄乐平，《新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经济改革道路的分化——以委内瑞拉和巴西为例》，<http://www.cssn.cn/news/512239.htm>；

王鹏，《对委内瑞拉可治理性危机的分析》

<http://ilas.cass.cn/u/wangpeng/%7B33A88F88-64F3-4B46-954D-83C29C91DF05%7D.pdf>

需要进一步加深理解的是：在全球金融资本危机2008年爆发、发达国家为了救市而制

造的过剩流动性大规模冲入能源市场、造成能源价格暴涨期间，委内瑞拉恰好因在此之前就已经把石油资源大部分收归国有而得到了政府财政“搭便车”地占有石油市场溢价收益的历史机会——国家财政直接占有增量石油收益，并由政府主导和资助全面推进“玻利瓦尔运动”，动员成千上万志愿者深入贫困社区，开展“参与式”小型工商业的社区建设，形成民众自我赋权的经济条件。这就在政府增加对贫民窟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的同时，初步形成了社会性的自主经济基础。

可以认为，这个被西方舆论热炒的“查韦斯革命”的实质，主要是借助政权更替从外国资本手中重新收回国家经济主权，得以由国家占有经济资源及其收益用于本国的民生建设。这个经验，客观地佐证了我们关于发展中国家“主权外部性”问题的分析；不仅表明这种外部性可以通过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意义的政治性措施予以改变，也同时让人警觉到，任何收回经济资源主权而内在地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措施，都会客观上引发那些跨国公司所在国的各种手段的对抗。

委内瑞拉经验在发展中国家之中确有一定的特殊性；相对而言，上文介绍的南非在获得政治主权的交易中失去国家对本国资源经济控制权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因此，这两个国家的经验构成进一步开展对比研究的条件。

通过以上案例比较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

其一，发展中国家能否突破发展主义困境的关键，不仅在于民众是否有能力改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桎梏，而且在于政府是否有条件把资本与风险集中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外部性)，以内部化的方式转移吸收。

其二，凡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获得完整“革命红利”、亦即国家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的独立国家，虽然没有主权负外部性造成的困境，但势必因无偿没收跨外部跨国资本和内部官僚资本的全部财产而遭遇前殖民地宗主国和流亡海外的政治集团的全面敌对！既然敌对，那么任何客观上的阴谋，主观上就都是阳谋，并且毋庸置疑地被纳入到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用于维护其政治正确，遂有冷战和后冷战延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化的“软实力”对抗。

然而，我们在以上案例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承担知识生产责任的知识分子也是利益群体，因长期接受殖民主义教育和文化浸淫而得到宗主国收益的分享条件，这种软实力控制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程度；由此造成“精英被俘获 (elites being captured)”：任何被这种软实力所困扰的发展中国家知识界的精英分子，都难以直视自己国家因主权外部性而身处发展陷阱无以自拔的事实。

如果发展中国家愿意摆脱西方软实力控制来看这个世界在二次大战之后的真实经验过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上只在受到中国土地革命直接冲击的“东亚社会”才有向所有农民平均分配土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且，这种被中国土地革命红利所波及或带动的制度变迁，也都成为东亚各国相继进入工业化的基本前提；无论这些国家信奉何种从西方舶来的主义或者是何种政治体制……

因此，重构对发展中国家真实困境的理性解读，是我们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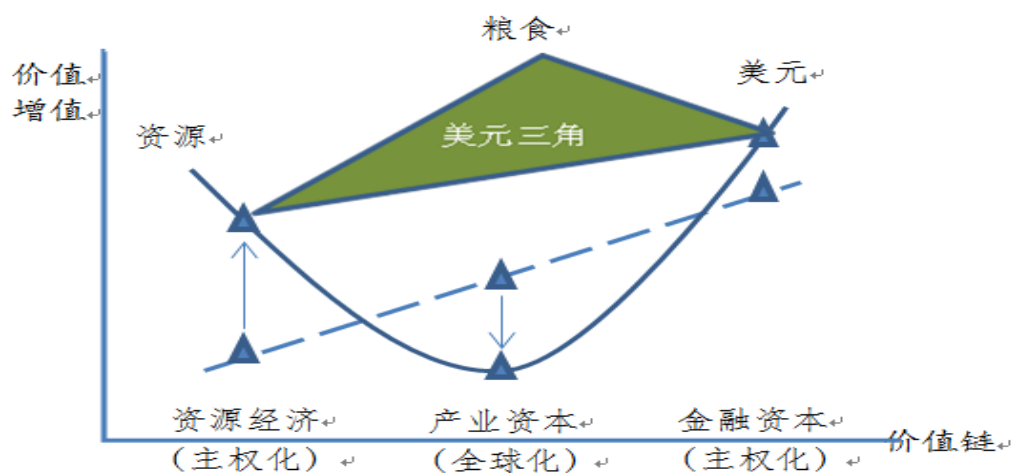
二、新时期币缘战略之下的“国家竞争微笑曲线”

纵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阶段，因资本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地缘关系成为了殖民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其目标为对资源的地理纵深控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

主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核心国家自二战後，已经形成制度权与话语权，遂得以把维护本国战略利益并极大化获得资本利润回报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制度成本和引发的金融危机代价，直接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转嫁给环境生态来承担。

先进国家因为大量进口廉价商品而长期保持最低银行利率，在其主导货币权条件下直接享有在本国低成本融资的竞争优势，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享受双重收益。一方面是低融资利率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得以占有其高利率的息差；另一方面，投资国货币汇率不断上升，迫使发展中国家更多支付本币购买外汇还本付息。这些，都使得币权国家的投资转化的外债增加，投资人享有在发展中国家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具体表现为道琼斯 500 工业股票指数长期居高不下。这有助于在主导国家资本市场上形成长期制度收益，吸引更多金融资本进入股市。

金融全球化的新币缘政治格局内在地决定着占有货币霸权的核心国家与产业国及资源出口国家之间的关系：货币霸权国透过巨额增发货币和债券信用来向原材料、能源和粮食市场转嫁其债务，不仅坐享铸币税，而造成全球战略性商品价格上涨，主要表现为能源(石油)及粮食价格上涨。本文用“国家竞争微笑曲线”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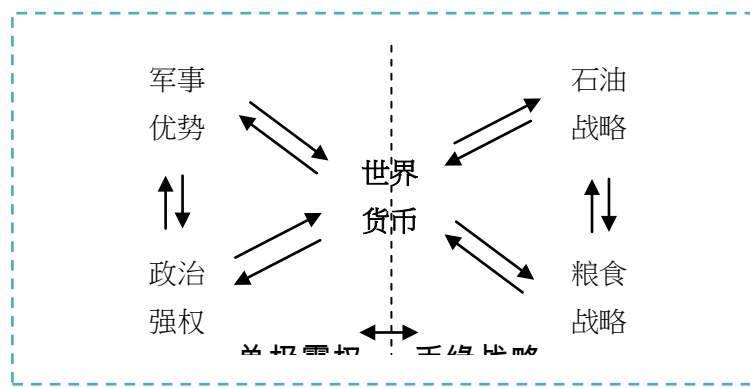
图中的虚线是产业资本阶段的传统收益曲线；实线是金融资本阶段的当代收益曲线。

在当代金融资本阶段，资本积累、收益和分配的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金融资本市场投机性波动的浸蚀下，产业资本阶段所强调的上下游衔接机制和企业的外部风险内部化功能被严重削弱，国际竞争格局亦随之改变成了“微笑曲线”：在这条微笑曲线上，自然资源、金融资本位于附加值最高的两端，形成两个上翘着微笑的嘴角；而曾经作为各项资源、要素

的组织核心的产业资本，则位于附加值最低的嘴巴底部。

同期，拥有资源主权的国家，可以搭便车地更多占有资源出口收益，用来进行社会再分配，降低其面对的风险系数，但同时面对币权国的敌视，不仅遭国际主流意识形态喉舌通过种种软实力而被妖魔化，并且有遭遇借巧实力实现军事颠覆的危机。

而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则要承受全球金融流动性增加造成输入性通胀所导致的高利率和低汇率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在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的生产成本和消费物价上涨压力下，政府一般都会提高银行利率，这就必然使本国投资品价格高于外国，失去与低利率外资竞争的可能性，遂以对外开放为名顺水推舟地拱手让出国内战略产业；另一方面，外资大量流入促使本国货币供应被迫对冲增加，一方面制造通货膨胀基础，另一方面导致本国货币的兑换率下降，偿付外债的汇率成本上升。因此，制造业为主的国家面对的风险系数最高。



用微笑曲线理论对本文三个案例做进一步分析，可知：全球危机之中的美国无论意识形态上怎样与委内瑞拉对立，却只能看着委内瑞拉凭借石油资源的国家主权搭上美国增发货币的“便车”：美国越是大规模增发货币、流入能源市场推高石油价格，委内瑞拉国家财政得到的石油溢价收益越多、用于反贫困和拉美区域整合的投入越大。可见，处于金融资本阶段世界货币的发行者美国对于以资源立国的委内瑞拉具有主权正外部性。但是，中国则同时承受着这两个客观具有“战略互惠”作用国家的主权负外部性。这一切对于在获取政治独立的谈判中失去资源主权的南非，则只能被跨国公司掌控其资源出口的溢价收益；本国经济几乎难有起色，政府对公众的政治承诺就难以兑现，社会冲突也不断爆发。

新币缘政治下的当代全球化格局，已经成为束缚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陷阱。换言之，制造业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最不利的位置。在当前的金融全球化体系下，追求工业化来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后发国家困难重重却百思不得其解。

三、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是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币权”时代的特征，即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

对此，不同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身主权外部性分析形成不同应对战略。

例如，南非应该努力完成至今未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引导国内被压迫黑人群体已经奋起的对于跨国公司的强烈反抗，夺回金融经济和资源经济主权。

再如，委内瑞拉则需要考虑币缘战略及其巧实力另外一种运作的可能：美国能源进口下降带动国际油价下跌，将会直接导致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收益下降，致使已经铺开的主要依靠石油财政的国内反贫困项目和国际上推进的拉丁美洲整合计划都面临投入不足的威胁。

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亟需恢复本国货币的主权货币性质，以实体经济为本来推进两个方向的战略调整：

其一是国内政策上加强内部整合，要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条件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条件来贯彻“从资本文明阶段向生态文明过渡”的国家意志；其中关键，在于把产业纵向一体化战略、区域生态化综合开发战略和“新民生主义”战略这三大战略综合起来，统筹协调，全面拓展国内已经过剩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资和长期发展空间。

其二是国外政策上不以中国近代史上屡战屡败的海权竞争为方向，而是以向无败绩的陆权竞争为对外战略思想的基础，利用中国结构完整的产业资本内在具有的纵向整合规律，西去中亚、西亚和北非，综合性和开发性地推进有利于复兴国家主权的基本建设及有利于复兴社会民生的配套投资，从而形成构建本国币缘战略安全的外部条件，据此构建大陆型国家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陆域战略纵深。